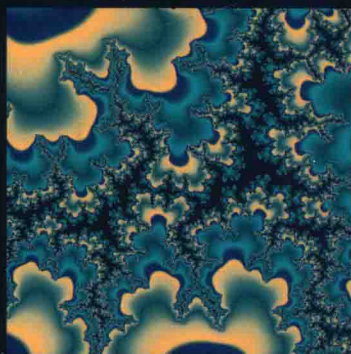


農村變革與中國發展（上卷）

1978-1989



周其仁編

農村變革與中國發展 1978—1989

上

周其仁 編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Toronto
Kuala Lumpur Singapore Hong Kong Tokyo
Delhi Bombay Calcutta Madras Karachi
Nairobi Dar es Salaam Cape Town
Melbourne Auckland Madrid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4

農村變革與中國發展 (上卷)
1978-1989
周其仁編

©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香港鯉魚涌英皇道 979 號太古坊和域大廈十八樓
ISBN 0 19 586576 6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農村變革與中國發展

1978—1989

上

主 編

甘 陽 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

編輯委員

王漢生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周其仁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系

崔之元 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

陳 來 北京大學哲學系

張隆溪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文學系

劉小楓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社會與思想叢書緣起

歷史悠久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從一九九二年起開始出版中文書籍。這或許預示着：中文這一為十多億人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在世界文化和學術的發展中將會日益取得其應有的地位。現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又決定出版「社會與思想叢書」，俾更有系統地積累有價值的中文學術著述和譯述，我們希望，這對於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將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社會與思想叢書」將首先着重於對中國本土社會與本土思想的經驗研究和理論分析。誠如人們今天已普遍意識到的，晚近十餘年來中國所發生的深刻變革，並非僅僅只是相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甚至一九一一年以來而言的變遷，而是意味着：自秦漢以來既已定型的古老農業中國，已經真正開始了其創造性自我轉化的進程。這一歷史巨變已經將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到了中外學者的眼前，例如，鄉土中國的這一轉化將會為華夏民族帶來甚麼樣的新的基層生活共同體？甚麼樣的日常生活結構？甚麼樣的文化表達和交往形式？甚麼樣的政治組織方式和社會經濟網絡？所有這些都歷史性地構成了「中國現代性」的基本課題，同時恰恰也就提供了「中國傳統性」再獲新生的歷史契機。可以說，當代中國的這一歷史變革已經為中國當代學術文化的突破性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歷史可能與堅定的經驗基礎，因為它一方面使人們已能立足於今日的經驗去思考中國的未來，同時也已為人們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去再度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明、中國的傳統性。有鑒於此，本叢書將不僅強調對當代中國的研究，同時亦重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以張大「中國現代性」的歷史文化資源。

「社會與思想叢書」的另一方面則是同時注重對西方社會與思想，以及其它非西方社會與思想的研究。如果說，晚近十餘年來的中國變革標誌着「中國現代性」的真正歷史出場，那麼，七十年代以來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現象無疑莫過於對「西方現代性」歷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檢討：在經濟領域，所謂「福特式大生產方式」的危機不僅促發對「後福特時代生產」的思考，而且首先迫使人們重新檢討「福特式生產」的歷史成因及內在闕失；在政治領域，西方現存體制與民權運動以來民主發展的尖銳張力，已重新激發西方近代以來「自由主義 v.s. 共和主義 (Republicanism)」這一基本辯論；在文化領域，形形色色的後現代主義不但已全面動搖近代西方苦心營構的文化秩序和價值等級，而且更進而對「西方傳統性」本身發起了全面的批判。所有這些都提醒人們：自上世紀末以來一直在學習西方的中國人，今天已不能不同樣全面重新檢討中國人以往對西方的理解和認識。因此，本叢書將不僅包括對當代西方的研究，而且更強調對西方歷史傳統的重新認識，特別是西方傳統內在差異性的研究。

本叢書定名為「社會與思想」，自然表達了一種期望，即：對社會制度層面的研究與對思想意識層面的研究，應該日益結合而不是互不相干。從學科的角度講，亦即希望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與人文及哲學領域的研究，能夠相互滲透，相互促進。通過多學科的合作與跨學科的研究去深入認識中西現代性與中西傳統性，以往那種僵硬的「傳統 v.s. 現代」、「中國 v.s. 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或將會真正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類對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同等尊重和相互理解。中文學術世界為此任重而道遠！

甘 陽

一九九三年十月

編者前言

這部文集，是從發展研究所及其前身，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在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年間的研究成果中選出來的。選編這樣一本書，按照這套叢書主編甘陽的意思，是要為海外中文讀者，提供一本可讀的關於中國大陸農村近年變化的同人之作。甘陽先生是研究文化和思想的，一九九二年中，突然有一篇《文化中國與鄉土中國》的大議論問世。是年他從芝加哥大學崔之元那裏看到一套發展研究所成果滙集，如獲至寶，一定要編出本書來。爾後，牛津大學出版社居然也被說動，同意出版。甘陽要我來編，情義皆不容辭。發展所及其前身發展組，係一群志同道合者，研究的問題，也與近年農村改革發展相關，這大體可以符合要求。難的是「可讀」兩字。海外中文讀者，大都住在見不到農民的地方；偶然見到的，也不是中國大陸農民。他們可願意來讀這些東西？實在沒有把握。於是甘陽說，牛津大學出版社對自己的讀者會有最好的判斷，你選出讓他們最後審定。今年夏天我回國，很快從北京寄給牛津一大包備選之作。但須交待，本書最後能出版，應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

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成立於一九八一年，當時是一個以曾經在鄉下生活多年的大學生和研究生為主的業餘研究團體。次年，正式建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但研究工作歸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中共十年農村改革政策的參謀本部——領導。一九八五年，陳一諮、王小強、白南風、宋國青等受命組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所，隸屬國家體

改委：發展組留下的研究骨幹，繼續研究農村問題，直至一九八六年四月正式組建發展研究所，直屬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這個研究團體，在八十年代的北京城裏，頗有一點知名度。這點讓人感到困惑的知名度，一是由於借了別人的光，一是由於這個研究團體成員們堅持十年的努力。

借別人的光，也就是「搭便車」(free rider)的意思吧。按照當代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的定義，搭便車是指個人(或團體)從公共活動中得到高於自己支付成本所得。任何社會過程中，只要存在着計量和界定各別貢獻份額的困難，搭便車行為總是難以避免的。

那麼，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及以後的發展研究所，借過哪些別人的光呢？

第一，借了中國農民的光。中國農民，人口眾多，天下第一。但在改革前，除貧窮之名遠揚，在中國社會中默默無聞。城裏人看不起鄉下人，由來已久，又於社會主義模式為最盛。可是，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八十年代的中國農民，着實令世界大吃一驚，讓城裏人不能不對他們刮目相看。農村改革之潮大漲，發展所這隻小船看起來就顯得又高又大，站在小船上的一批年青人，似乎也就與眾不同。

其實，開頭只不過是當過農民的回城知識青年，為老鄉們自發的包產到戶仗義執言。比方收入這本文集的首篇文章，就出於當時一股不平之氣。當時安徽四川等地的包產到戶已經自發推開，北京城裏照例擺開爭論一場。攻之者責問「方向」，辯之者依托「產量」。為什麼增加產量的辦法，一定就違背方向呢！兩位作者，年少氣盛：你們可以寫，我們就不會寫嗎。因有此作。文章寫出後，沒有地方可以發表，經王耕今先生

(當時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後來當了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的第一任組長)推薦，送一九八〇年全國農業經濟學會年會。記得會上一位什麼地方的權威找到北京農科院院長的秘書趙曉冬問：這兩個人是不是共產黨員。趙答，不是。此權威又講，你總是共產黨員吧，共產黨員可不能理這兩個家伙。真是夠刺激。

後來到包產到戶發源地之一的安徽農村調查，才知道農民及其精英承受過真正的風險。陳錫文，後來的發展研究所所長，一九八一年盛夏時節在鳳陽縣小崗生產隊蹲過近二個月，帶回來的故事聞者無不為之動容。小崗在一九七七年第一個實行包產到戶時，共十八戶人家。當時十八個家庭聚首生產隊長家，約法三章：一、保守秘密；二、萬一事敗隊長被抓，十八戶輪流送飯；三、共同撫養隊長的兒女。這就是說，準備被抓，甚至被殺頭。古之桃園三結義，為的是奪天下霸權；今之小崗十八結義，卻是為了用更合理的辦法種地。社會主義模式，不改革還得了嗎？經過這個夏季的社會調查(綜合報告收為本文集第二篇)，發展組的絕大多數成員，下決心研究農村改革。

包產到戶推開之後，雇工問題、長途販運問題、鄉鎮企業問題、農產品市場開放問題、農民流動進城問題、相繼提上日程。每個問題都面臨一場大爭論。因此這些題目都成了發展組/發展所的研究課題。讀者翻閱本文集時可能會發現，這些研究報告無一是從已有文獻中尋找題目和靈感的，無非記錄農民走出的腳步，讀來樸實無華，可算自成一家。

中國農民在改革的路上越走越遠，才使發展所的文章越做越氣派。否則，怎麼會去議論國民經濟新成長階段呢？其實，文章手筆再大，遠遠不及實際生活變化的深刻就是了。今天我們不是都可以看到，幾乎在國民經濟的任何一個重要的部門

中，都有日益增長的「農民份額」嗎？海內外輿論，早有中國大陸改革重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之說。依編者今年夏天回國的觀察，農民們已經直搗城中了。從京師之地，到內地小鎮，任何城鎮，任何行業，差不多都有農民插足其間。今天他們彎着腰鑽進去，明天要在那裏抬着頭站起來。一批新的，沒有社會主義體制病的「城裏人」正在成長起來。長期以來，困擾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城鄉隔絕」，或「高度工業化但沒有相應城市化」的模式，可能用不了這一代青年農民的努力，就可以矯正過來。中國的國民經濟好比裝上了一個更大功率的發動機。搭上這樣一條乘風遠航的大船的，豈止小小一個發展所，幾乎國民人人有份，真是借了光！

在社會對農民的歧視還頗為普遍的時候，你去借農民的光，他們都會感謝你。一九八六年春天當陳錫文和杜鷹率發展所全體研究人員重訪鳳陽時，被當地父老親同自己的子弟。捫心自問，何功之有？無非在當年去過訪問他們，並寫過幾個研究報告為安徽包產到戶的農民講了話。這麼一點事，那裏有的人多少年後還記得。農民的公道和農民對這群青年知識分子的認同，是發展所的精神底氣之所在。人生在世，得中國農民的一份親情，不是很寫意的事情嗎？這份情感上的報酬，抵銷了久住北京難免會遇到的全部不愉快還有餘。這不也是借了農民的光嘍。

第二，借了分權化改革的光。從發展組到發展所，都同中國政策的決策系統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收入本文集的一些作品，也是當時寫給決策者做參考的。這個特點，可能是發展所在城裏和海外有點名氣的另一個原因。

最初，總是一些偶然因素起了作用。比方，發展組的實際創辦人陳一諮同當時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鄧力群之間，有一

段始於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友誼。當時陳在河南下放，與鄧的兒子鄧英洵住在一個村子。陳回北京時，探望過鄧力群，議論時政，對江青幫的統治表示不滿。由這一點，鄧對陳有好感。又比方，當時國家農委常務副主任（主任為萬里）杜潤生一位老戰友的兒子白若冰，恰恰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的資料室工作，因此不少人民大學的下鄉知青回城學生，在一個跨學科讀書會表現出來的一些新見識，也通過白的間接介紹，在杜潤生的頭腦裏，留下過最初的印象。因此，一九八一年二月發展組這樣一個研究團體在北京大學召開成立會時，竟同時請動了鄧力群和杜潤生兩位到會講話，表示支持。八十年代早期，鄧力群為鄧小平和陳雲信用；杜潤生則對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直接負責。在當時條件下，這兩位中央要員的支持，免去了發展組成立時期的許多麻煩。須知那時正值民主牆運動被掃蕩，每一個大學裏對任何學生的自發團體都高度敏感。

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於一九八二年由業餘研究團體轉化為正式建制在社會科學研究院（保留原來名稱），則是根據趙紫陽的指示。趙是看到發展組在安徽調查的報告後，對這個小組的工作表示讚賞。他在這份報告上批了一大段話，其中一句講，這個報告對包產到戶後的農村情況，講得一清二楚。後來在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趙紫陽又提到發展組的調查工作，並提出中央各機構都應從曾經下鄉，又受到高等教育的應屆大學生、研究生中，抽選一批來作調查研究工作。其時鄧力群是中央書記處書記，會後把趙的上述講話印送國家計委和國家人事部，並關照有關方面解決建制後發展組的文件閱讀和資料報送。這樣，發展組順利完成建制。當時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已經成立，因此發展組的研究工作，從此，便一直在杜潤生領導下進行。

但是無論鄧力群還是杜潤生，更不用說趙紫陽，支持農村發展研究組都不是出於兒女情長。當時中央決策集團一個迫切的要求是要了解社會底層，特別是農村社會底層的真實情況。這個要求，源於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的改革方針。

原來中共的體制，高度中央集權。比較制度學家說，中國的計劃程度遠低於蘇聯。這是事實。但同時還有另一個事實，中國的中央集權程度，一點都不比蘇聯低。中國的廠長經理，固然不必接受蘇聯同行面對的那般仔細的計劃指令，但是蘇聯的廠長經理，永遠沒有叫批林大家一起批林，叫批孔一起批孔，叫讀《紅樓夢》都讀《紅樓夢》的經歷。農村方面的事務，辦多大的公社和生產隊，能不能包產到戶，要不要大辦食堂，吃不飽飯的食堂要不要解散，農戶可不可以養母豬，集市貿易是開放還是關閉，諸如此類，都只能由中央甚至中央主席來拍板。這就是說，中國的中央集權制不但通過指令計劃，而且通過政治和意識形態控制。這個高度中央集權的體制，到七十年代末無法繼續運轉。毛澤東主席晚年透支了他個人的崇高威望，以至他身後，沒有任何一位政治家可以沿用他的模式來治理中國。改弦更張的辦法之一就是採用分權化改革的新方針。鄧小平取此策，首先還不是迫於經濟形勢的要求，而是出於對政治力量新平衡的估量。言中國改革僅為經濟改革，恐怕是對中國現實的政治變化缺少認真觀察的一個結果。

分權化改革，導致決策集團眼睛必須向下。信息分散於各處，新故事每天在底層發生。不掌握這些，憑甚麼決策呢？領導人親自下去調查，當然也是獲取信息的一種辦法。但中國有些老毛病根深蒂固，比方下級哄上級，以及系統地製造假象。一九八三年發展研究組有一次向萬里匯報在江西、浙江等地農

村調查的結果。萬里問，你們講的這些故事，怎麼我下去都聽不到？他自己回答：我們下去，到了省，省委書記陪上，到了地區，地委書記陪上，然後是縣委書記，鄉的書記和大隊書記，等見到農民，已有六七個書記，人家要同你講真話也難。萬里最後說，你們要多下去跑。

分權化改革，也導致對真實情況的判斷越來越困難。八十年代中後期的北京，或推而廣之在各個省城，形勢討論會層出不窮，就是因為改革推進之後，如何準確估量形勢成為進一步作出正確決策的關鍵。這種時候，需要專業化的頭腦，從不同的角度提供判斷。這個方面，趙紫陽的需求最為旺盛。這位領導人，對「事實和包含在事實中的邏輯」有着持久的強烈興趣，又對各派見解兼容並蓄並善於綜合判斷，無法不讓人心折。趙有長期在地方主政的豐富經驗，又偏好調查研究而從不喜歡黨八股。他開口講話，要麼提出一些日思夜想的關鍵問題來，要麼概括事實，要麼提出在事實中發現的道理。他講話的口氣總是討論式的，沒有那種不容討論的官腔毛病。難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里得曼(Milton Friedman)一九八八年會見趙之後，認定趙在本質上是一位教授，而決不是一個政客。(張五常，《存亡之秋》，第107頁。)這樣一位「教授」，恰恰又在整個八十年代主政中國經濟改革，怎麼不使青年知識分子躍躍欲試，爭相推銷自己的一得之見呢？趙紫陽似乎也有意要在正式的官方信息通道之外，保持一個彼此競爭的、由活躍的青年知識分子提供情況和建議的信息通道。講起來也怪，趙紫陽身邊的同事和助理，無論年事資歷多高，個個都有一套吸引年輕人的本事，身邊都聚集着一批年輕的專業頭腦。他的一些年輕助手，如李湘魯，本身就是文化革命中深入中國社會底層這一代青年知識分子中的佼佼者，同這一代人中許多優秀分子，

保持着廣泛的聯繫。趙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在做決定的時候，聽各種意見又不偏一家一派之詞。很多北京的年青人後來發現，趙紫陽開明，但並不隨風倒。許多關鍵問題上，要說服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使人想到一九八九年後海外輿論，有一個「趙紫陽智囊」的稱謂流行一時。其實，按發展所的情況來看，青年們同趙紫陽的對話，如同參加一個大牌教授的seminar，每次下來，都有一股動力重新讀書，重新收集和整理事實，重新改造自己原來頗自以為是的見解。怎麼敢當「智囊」？能夠影響趙決策的人物不是沒有，不過一九八九年後差不多都留在國內和趙紫陽一起受審查（其中鮑彤先生至今還在秦城監獄），不大可能跑到海外來風光一番的。至於「六四」以後一段時間的國內輿論，乾脆把官倒貪污、通貨膨脹一古腦兒扣到趙紫陽及其身邊一群研究生身上。姑且不計較那些文章寫得比當年姚文元的還整腳，退一步講，如果這些指控成立，那麼趙紫陽下台後，中國就該永無貪污腐敗和通貨膨脹。可是為甚麼今年夏天以來，世人又見中國整頓金融，又見中共大反腐敗了呢？問題還是要回到如何認識社會主義改革這樣的根本問題上。無論如何，廣開言路，是分權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趙紫陽奉行分權化改革方針，他又領廣開言路風氣之先。這兩件事裏，包含着重要的內在聯繫。

這等於說，分權化改革開發出了一個決策信息市場，發展組／發展所身逢其時，供應了一點農村社會真實情況，也提供了一點自己的分析判斷，創出一小塊招牌。隨着分權化改革的深入，決策信息市場會越來越開放，專業性要求會越來越高，而舊日的神秘色彩會日益消失。今後一個時代，任何決策信息產品，將在更加激烈的競爭中被定價。後人來看發展所早期的工作，難免不會有「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的感嘆。問題

是，這些幸運的小子們是否辜負了他們偶然得到的機會了呢？這只能由讀者們去判斷了。

發展所止於一九八九年。是年五月十九日，早於李鵬宣佈北京戒嚴的幾個小時，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所、國際開放研究所、發展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經濟學會一道，共同發表了贊成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關於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礎上解決天安門廣場危機，反對動用武力的聲明。「六四」之後，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被撤消，隸屬於這兩個機構的發展研究所也被撤消。偌大一個農民人口佔多數的國家，容得下多少官僚衙門，偏偏容不得一個口碑頗好的農村改革政策研究機構。許多連續性的觀察和研究，不得不中斷。這是最令人痛心的事情。

經過這場中國改革史上的悲劇之後，讀者也許關心本書作者們的新的下落。下面略作介紹。

陳錫文，發展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所長。一九八九年後被停職審查兩年，一九九一年起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今年起任部長。

杜鷹，發展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副所長。天安門事件時正訪問西班牙和英國，回國後主持發展所解散善後工作，目前任農業部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農村改革實驗區辦公室主任。

白南生，發展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社會學研究室主任。事變後被捕，關押於秦城監獄兩年。目前在北京開辦「康運信息諮詢公司」，任總經理。

高小蒙，發展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市場研究室主任。一九八九年時養病在家，一九九二年到美國哈佛大學作訪問學者，不幸於次年二月十八日在波士頓因意外事故死亡。

高山，原發展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區域經濟研究室主任。一九八八年調任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副局長。一九八九年五月因鮑彤案被捕並被判刑，於一九九三年六月釋放，目前正創辦個體公司。

孫方明，高級研究員，一九八八年調任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副局長，一九八九年五月後被分配回貴州工作。一九九一年起任中國國土經濟研究會副秘書長。目前是海南三亞市亞龍灣開發公司總經理。

白南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研究室主任。一九八九年五月被捕，關押秦城監獄兩年。目前任中國珠海恆通置業公司北京辦事處主任，兼海南文化旅遊公司總經理。

鄧英洵，發展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後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經濟發展研究所副所長。

張本生，中國村鎮百業信息報社長兼總編輯，一九九三年八月調任西藏自治區林芝地委書記。

白若冰，中國農村讀物出版社社長。

謝陽，發展研究室高級研究員，綜合研究室主任，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綜合研究室主任，中國國土經濟研究會副秘書長。

李國都，發展研究所中級研究員，編輯室主任。目前在中國輕工產品質量檢驗中心任總裁助理。

劉守英，發展研究所中級研究員，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土地制度課題組組長。

其餘幾位作者，一九八九年以來分別在歐美一些大學作訪問學者和攻讀學位。他們是：王小強，英國劍橋大學；宋國青，美國芝加哥大學；羅小朋，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盧邁，美國哈佛大學；周其仁，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